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錢賓四先生全集 ②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第五冊

錢 穆 著



序

此爲余彙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之最後一冊。初，余在民國二十年秋始赴北京大學任教，即開設「近三百年學術史」一課，講論有清一代之學術。越二年，全部講義成稿，付上海商務印書館承印出版；距今已四十餘年。稿既成，又獲戴東原孟子私淑錄一種，乃戴氏未刊之稿，又章實齋未刊稿二十餘篇。時日軍已占北平，余藏其稿於衣箱之底，輾轉自天津抵香港，携赴衡山南嶽，又轉自昆明携赴成都；始刊布於四川省立圖書館之圖書集刊。有關章氏各稿，嗣經大陸再版，又分散入章氏之文史通義中；而戴氏一稿，則抗戰勝利後，迄未爲人注意，今以附刊此集中。

又余在成都，受政府之命撰清儒學案一書。時政府擬編宋、元、明、清四朝學案，其前三朝分囑他人刪約黃、全兩學案爲之；清代以諉余，定時限，定字數。余在成都郊外賴家園齊魯大學

國學研究所，窮日夜之力依約草成。時適有友成都新識彭雲生教授亦治理學家言，赴西安，余懇其代搜有關清代關學各家成書。雲生覓得近二十種左右携返，有清一代關學材料幾備，其中極多外面未流傳者。余撰學案此一部分，最自愜意。又余爲李二曲撰新年譜，凡二曲一生思想著作，分年編入，所化精力爲尤多。又余從四川省立圖書館及賴家園某氏藏書中得遍讀「寧都七子」之各書，自謂此一編亦甚得意。其次則爲蘇州汪大紳以下，彭尺木、羅臺山各家集，亦提要鉤玄，頗費苦心。竊意學案一書，此三編或稍有價值。惟其時生活，備極窮窘，中午喫麵湯，晚餐進稀粥，終未得白米飯入口。稿成不及另鈔副本，即郵寄重慶國立編譯館。不意其他宋、元、明三朝學案之節本皆遲未交稿；而編譯館擬俟全稿交齊始付印。而日軍忽投降，勝利還都。余之學案一稿，乃由編譯館雇船載返南京；有數箱書中途沉沒長江中，余稿亦在內。僅有序目一篇，余寄稿前錄存，曾刊於四川省立圖書館之圖書集刊內，一鱗片爪，姑供想像者惟此已。

及余既撰朱子新學案，又草寫研朱餘瀝一書。其前諸家均已散入本編之第六、第七兩冊。此編所收。如顧亭林、呂晚村諸人，於學術史爲重見，但寫法微有不同；如陸桴亭、王白田諸人以下，則於學術史後又重寫；又有舊稿如顧景范、崔東壁諸篇，乃在北平舊作；本編最後章太炎一篇，則應中央研究院五十周年紀念所寫。彙收於此，先後亦逾四十年矣。回念前塵，不勝惘然。

余患雙目不能見字，及今已近兩年，此編各稿皆由及門何君澤恆代爲搜集，又代校字；積年陳稿，已不能親讀一過，一仍其舊，未能續有所改定，幸讀者諒之。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孔子誕辰前兩週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五。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

目次

序	五
* 一 述清初諸儒之學	一
二 略說乾嘉清儒思想	五
三 讀朱舜水集	一九
四 陸桴亭學述	二九
* 五 余君英時方以智晚節考序	七五
六 顧亭林學述	七九
* 七 王船山學說	一〇九

八	王船山孟子性善義闡釋·····	一二九
九	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輿紀要·····	一六九
	〔附〕 夏定域「讀錢賓四先生康熙丙午本方輿紀要跋」後語·····	一七六
一〇	跋嘉慶乙丑刻九卷本讀史方輿紀要·····	一七九
一一	陸稼書學述·····	一八七
一二	呂晚村學述·····	二一三
一三	跋車雙亭刊呂子評語·····	二三三
* 一四	記呂晚村詩集中涉及黃梨洲語·····	二四一
一五	讀張穆著閩潛邱年譜再論尙書古文疏證·····	二五三
一六	記姚立方禮記通論·····	二七一
一七	續記姚立方詩經通論·····	二九五
一八	王白田學述·····	三〇一
一九	記鈔本戴東原孟子私淑錄·····	三二九

〔附〕	孟子私淑錄	三三七
二〇	讀姜白巖尊行日記	三七三
二一	錢竹汀學述	三七七
二二	讀段懋堂經韻樓集	四〇七
二三	記鈔本章氏遺書	四二一
〔附〕	附記	四二八
二四	崔東壁遺書序	四三一
二五	讀古微堂集	四四五
* 二六	跋黃汝成日知錄集釋	四六三
* 二七	讀鄭獻甫補學軒散文集	四七三
二八	羅羅山學述	四八一
二九	朱九江學述	四九五
* 三〇	朱鼎甫學述	五〇九

三一	讀康南海歐洲十一國遊記·····	五一七
三二	餘杭章氏學別記·····	五三三
三三	太炎論學述·····	五三九
* 三四	略記清代研究竹書紀年諸家·····	五六一
* 三五	漢學與宋學·····	五七一
* 三六	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	五八一
三七	清儒學案序目·····	五八九
*	〔附〕 後跋·····	六一九
*	〔附〕 清儒學案摘鈔（柳詒徵摘鈔）·····	六二一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

述清初諸儒之學

言神州學風者，莫尙於清初。上承宋明理學之緒，下啟乾嘉樸學之端。有理學家之躬行實踐，而無其空疏；有樸學家之博聞廣覽，而無其瑣碎。宋明諸儒，專重爲人之道，而乾嘉諸儒則只講讀書之法。道德、經濟、學問，兼而有之，惟清初諸儒而已。言其環境，正值國家顛覆，中原陸沉，創鉅痛深，莫可告語。故一時魁傑，其心思氣力，莫不一注於學問，以爲守先待後之想。而其行己持躬，刻苦卓勵，堅貞不拔之概，尤足爲百世所仰慕。要而言之，則「厲實行」，「濟實用」之二語，蓋足以盡之也。

其在北方者，有夏峯、有二曲、有習齋，南疆則梨洲、船山、桴亭，而亭林則以南人居北，皆爲風氣宗主。其生活，北方三賢皆絕艱澁。二曲、習齋，崛起寒微，荼毒尤甚。南方諸君子則

皆身預興復，心長力絀，退而窮居。首陽之餓，釣臺之哭，則南北同之。苦節貞操，尤以亭林、二曲爲顯。亭林之拒招也，曰：「願以一死爲謝。」又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崑山既貴，亭林遂絕意南首，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此之較之龔生之遯莽、管君之逃魏，其意味異同爲何如耶！至如二曲，昇牀稱病，絕粒至六日夜，猶不得免。拔刀自刺，永棲聖室，幾二十年，所謂「從容懷白刃，決絕辭華輓」者。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二曲與亭林，皆孟子所謂「大丈夫」者也。若梨州礪而不淬，船山聲光閭然，亦皆貞元之運之所托矣。

至言其性情，則此六七君子者，皆至誠惻怛、忠孝節義之人也。梨洲早歲，袖椎復仇。亭林守遺命不事二姓。船山引刀自刺肢體，投賊救父。夏峯慷慨急難，有「范陽三烈」之稱。而廬墓六年，不飲酒，不食肉，先後如一日，此豈志行薄弱者所能強僞？二曲養母終年，遂至襄陽覓父遺骨。習齋年五十走遼東，卒得父墓。皆哭泣如初喪，歸而終三年之禮，哀感動天地，非孟子所謂「大孝終身慕」者耶！

言其爲學。二曲幼孤，就塾不能具脯。師不納，母曰：「無師遂可以不學耶！古人皆汝師。」

二曲感奮。家貧無書，從人借觀，悉讀經、史、二氏百家諸書。亭林足迹遍天下，每行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呼老兵退卒詢問曲折，即坊肆中發書對勘。或經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即鞍上默誦諸君注疏。偶有遺忘，則坊肆中發書熟復。其力學如此。知今世以貧無師、忙無時爲不學諉者，皆「舍曰不欲而爲之辭」者也。凡此六七君子，居亂世不廢其業，豈偶然哉！

言其治生。夏峯、習齋，皆能躬耕。亭林墾荒塞上，具有成效。皆非口舌游食，異於他士。至強毅尙武，習兵戎，如桴亭十五學擊劍，習齋逆旅中與大使季子青較刀法，夏峯守容城，力拒流寇；入五公山，比之田子泰之徐無山。涉兵革，講自衛，固不徒在意氣操尙之間也。

此六七君子者，其生平大節，略具如是。卒皆躋於壽考，巍然有「後凋」之驗。故夏峯年九十二，梨洲年八十六，二曲七十九，習齋、亭林皆七十，桴亭亦六十一。同時有朱舜水，獨居異邦，遂開東國士風。唐子大陶著潛書，亦與諸賢桴鼓。其一時興起，如張蒿庵、李天生、王爾緝、陳確庵、劉獻廷、李恕谷、王崑繩、萬季野兄弟，皆篤學博聞，能措之世用，與空談心性及溺意訓詁考據者異其趣。蓋猶諸賢之精神也。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世亂無極，橫流在眼，每讀史至此六七君子者，而使人低徊嚮往於不能已。夫亦時運之適逢者耶！因綜其要略著於篇，以期夫有志者共勉焉。至於學術之大且要，皆有成書，此不具。

（此稿寫於民國十七年，刊於該年三月蘇中校刊第二期。）

略說乾嘉清儒思想

清儒學術，就晚明諸遺老言，直承晚明而來，但未依晚明的路向發展。在晚明諸老心中，藏有兩大問題：一是宋明儒的心學，愈走愈向裏，愈逼愈渺茫，結果不得不轉身向外來重找新天地，這是學術上的窮途。另一則是身世上的窮途。晚明不比北宋中期，正當宋代無事將及百年，社會文物隆盛，他們不甘再沒溺於道、佛方外消沉的圈子裏，一時翻身來講人文大羣政治教育一切積極事業。他們心中只知道回復三代、孔、孟，這是全部樂觀的。晚明諸遺老則不然，他們是亡國之餘，子遺的黎民，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政治教育各方面都想從頭有一番仔細的認識，到底那些是有真正價值確可保存或發揚的？那些是要不得的？當前大禍，究竟由何招致？均須加以思索研尋。因此北宋中期的心情是高揚的、喜劇式的，晚明諸遺老則是低沉的、悲劇式的。北宋中期常見其昂首好古，只要把三代、孔、孟來代替魏、晉、隋、唐與釋迦、達摩，他們的心情常見

是情感的、宗教的與經學的。晚明諸遺老則在途窮路絕之際，重回頭來仔細審量與考察，他們的心情常是理智的、社會的與史學的。但是晚明諸遺老的學術路向卻並未能順遂發展。第一是滿清的部族政權，很快安定下來，社會有秩序了，民生轉入順境，又朝廷刻意牢籠，威懾利誘，把一輩讀書人盡要拉入政治界，雖不斷有極度慘酷的文字獄興起，但晚明諸遺老的悲劇心情到底是逐步消散了。而且拉入了政治界，又不許你認真作政治活動，只要你消極順命、不貪污、孤立安本分，教育更講不到，只須你應舉守法，如此則自不許你認真用理智頭腦來講史學。晚明諸遺老的史學，其實是一種「變相的理學」，亦可說是一種「新理學」，他們要用史學來救世教人。現在則世已太平，人已安業，大家上奉朝廷法令，應科舉，守官職，一切有滿洲皇帝作主，不用操心，操心反而惹禍殃，晚明諸遺老一片史學心情到此無可寄託。心情變了，學術如何能不變？但清儒即晚明諸遺老以下，乾嘉時代的清儒，亦沒有大氣魄人來領導此學術之變，而且他們內心深處並不是要變，只是外面環境逼得你走委曲路。這有些像魏晉王弼、何晏講儒學，阮籍、嵇康講莊老，全是沒氣力，由外面誘導擺佈，並非內部激發推動。晚明諸遺老的史學，於是到清儒手裏便變成一種專尚考據的經學了。

經學本來帶宗教氣味，中寓極濃重的人生理想，但清儒經學則不然。清儒經學，其實仍還是

一種史學，只是變了質的史學，是在發展路上受了病的史學。經學在外面是準則的，在內面是信仰的，因此治經學者必帶幾許宗教心情與道德情味。但清儒經學則是批評的，他們所研究的幾部經籍，只是他們批評的對象。他們並不敢批評經籍本身，卻批評那些經籍的一切版本形式與文字義訓。所謂「文字義訓」，亦只是文字的訓詁注釋，尤其是在與人生道義與教訓無關的方面。換言之，是那些隔離人生較遠的方面。他們治尚書，並不是爲的政治楷模；治詩經，並不是爲的文學陶冶；治春秋，並不是爲的人事褒貶；治易經，並不是爲的天道幽玄。他們只如史學家般爲幾部古書作校勘與注釋的整理工作。再換言之，他們只是「經學」，而非「儒學」。東漢經學還有儒生氣，清儒經學則只有學究氣，更無儒生氣。總之是不沾着人生。他們看重論語，但似並不看重孔子。他們只看重書本，但似不著重書本裏所討論的人生。這如何算得是經學呢？

清儒研經之外，亦治史學。但他們的治史，也像他們的研經，他們只研究古代史，不研究現代史。他們只敢研究到明代爲止，當身現實則存而不論。他們的治史，亦只爲史書做校勘整理工作，卻不注意史書裏面所記載的真實而嚴重的人事問題。清代學風，即乾嘉時代的學風，總之是逃避人生。魏晉南北朝時代之逃避人生是研讀老子、釋迦，清代的逃避人生是研窮古經籍。

但清儒到底也有耐不住的時候，或者是他們的不自覺而對人生問題有所論列，則他們亦有一

共同態度與共同意見。他們大抵反對擡出一個說法來衡量一切或裁制一切。換言之，他們反對思想上的專尊，或說人生理論上之獨斷。他們大抵主張解放，同情被壓迫者。他們的氣味，寧是反經學的，至少是非經學的，所以說經學不是清儒自己要走的路。

清儒思想之常主解放，同情被壓迫者，就乾嘉時代言，可舉戴東原與錢竹汀兩人爲例。此兩人乃乾嘉盛時最標準的學者。戴氏偏向經學，錢氏偏向史學，而兩人都抱有一種平民的同情，解放被壓迫者的情調。錢竹汀經、史、小學無不精擅，其學卓絕一時，其集中似乎很少涉及思想史方面的問題。此處特舉錢竹汀，正好做一個不自覺而流露其思想態度者之代表。至戴東原則高言放論，可謂是一位耐不住而披露其思想態度之代表人。錢竹汀有春秋論，謂春秋誠是一部褒善貶惡的書，但其褒善貶惡，只在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用不着另有筆法來做褒貶。他說：「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如此則豈非史書褒貶，正好在不褒貶，只直書其事以待後人之自下評判。這是何等平恕的見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自序，並與錢氏同此見地。）竹汀又有大學論，謂：

大學書與論語「忠恕一以貫之」之旨，若合符節。古之治天下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身之